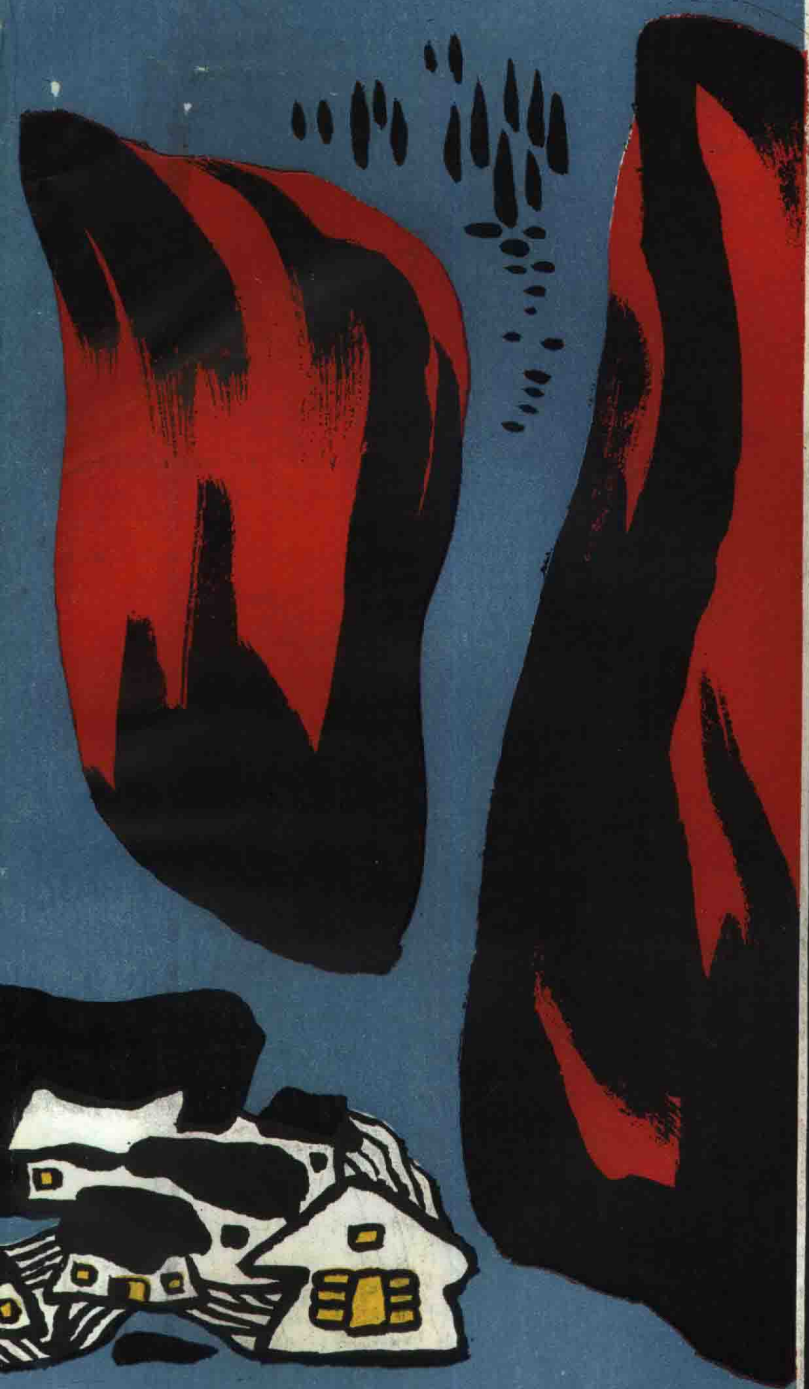


唐代边塞诗选注

胡大浚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唐代边塞诗选注

胡大浚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唐代边塞诗选注

胡大浚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75 字数300,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423-0158-6 / I·4 定价:6.20元

序 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代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边塞诗则是唐代诗苑中秀色独具的苑囿。宋代杰出的诗论家严羽说过：“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不但把征戍列为“好诗”之首，后几类也多与边塞有关。事实如此。唐代边塞诗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有许许多多优秀作品，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动人心魄，发人遐思，虽流传千年而丝毫未能消减其艺术的魅力。象“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浩瀚图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狂豪歌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爱国忧思，“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报国壮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醇醪别情，“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凄凉怨叹，以至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瑰奇画面，广大青年朋友，诗歌爱好者，哪个不谙熟于心，长吟在口？完全可以说，至今脍炙人口的唐诗优秀篇章中，边塞诗占有相当的比重。边塞诗是唐诗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

边塞诗是大西北的歌，是大西北的骄傲。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中国诗歌史上，只有唐代边塞诗是如此集中、大量、多侧面地描绘、歌咏了大西北的历史生活。唐代边塞诗最集中地描写了中古时代我国大西北壮伟奇丽的风光景色，西北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民情风俗，充满魅力的“异域”音乐舞蹈，民族间的友谊交往与争战杀掠，展现了戍守边疆将士丰富多采的生活画面，

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唐代三百年盛衰的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正因如此，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和唐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在西北更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仅仅从阅读欣赏的角度说来，当我们吟咏着那些描写故乡山山水水，记载着它的荣耀与屈辱，先人的欢乐与血泪的作品，当会感到特别地亲切，从而细细品味它的精神意蕴！

唐代边塞诗当然也写到东北，也写到西南以至南疆，但主要是沿长城一线，尤其是西北，陕、甘、宁、青、新，还有内蒙古沿边一带，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看唐代边塞诗中大量写到的便是陇山陇水，青海戈壁，玉塞萧关，祁连昆仑……还有黄河长城，这些孕育中华文化的圣地；虽然有不少边地荒寒凄苦的内容，给人历史的深沉反思，但更有浩瀚雄奇的气魄，令人胸怀壮阔，豪情激越，向着那伟大历史文化作不懈的追求，接受精神的陶冶！

如此充实丰富瑰奇多彩的艺术之花，何以绽开在那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的瀚海荒原之上？它为何在有唐一代繁荣一时，以至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一枝独秀”的地位，甚至成为“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从总体上一般地说来，它当然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这样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舍唐而外，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朝代全面具备这种条件，因而必然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边塞诗创作的高潮，产生可与媲美的作品。然而就唐代众多诗人热心于边塞题材的开掘，边塞生活的表现，不但“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殷璠《河岳英灵集》论崔颢），而且未涉塞垣，皆说戎旅；写边塞、说戎旅成了一代之风，反映出朝野上下关心边塞，向往边塞，崇尚戎马功名，异域风情，则当有其深刻的特殊的原

因。林庚先生说得好，边塞诗的引人入胜之处，“主要的是一种悲壮的豪情，异域的情调，辽阔的视野，边防的信心”，“没有生活中的无往不在的蓬勃朝气，所谓边塞风光也早就被那荒凉单调的风沙所淹没”（《唐诗综论》60—61页）。边塞歌唱之盛极一时，乃是一种时代精神，一个特定时代社会文化心理的生动的表现。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文学作品是心灵与情感的产物，是作家审美意识的外化。这种审美意识以创作过程中独具个性的题材选择、情感评价、风格特征体现出来。从作家个人说来如此，从一个时代的文学趋向说来也是如此。一个时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美学趣味，情感趋向，独具特色的题材内容和风格特征，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这是勿庸赘言的。

纵观四唐边塞诗的一个基本主题，就在于宣扬大唐国威，抒写从军报国，安定边疆的壮志豪情。从唐太宗“胡尘清玉塞，绝漠干戈戢，荒裔一戎衣，云台凯歌入”（《饮马长城窟行》）的自抒心志，到初唐诗人们众多的歌咏，他们追求的乃是“将军拥麾宣庙略，战士横戈静夷落”（辛常伯《军中行路难》），“单于拜玉玺，天子按雕戈”（卢照邻《上之回》），是“一朝抚长剑，万里入荒陬，岂不服艰险，只思清国仇”（张宣明《使至三姓咽面》），希望以此实现“制为百王式，举合千载防。马牛被路隅，锋鏑销战场”的“永康”的理想（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城》）。这是一种对国家强盛的自信和期望，以武止戈的追求和向往，而丝毫没有黩武嗜战、奴役异族邻国的野心。正是它开启了唐代边塞诗进步的传统，成为一代边塞诗的主流。随着王朝帝业昌盛，盛唐边塞诗在这一基本主题上有了多方面的开拓，更加深

刻地揭示出那一时代边塞斗争的全貌。除了对边策不当，边战失利，军中腐败等等的倾诉，可视为这一主题的深化外，其主要方面，则仍集中在对帝国声威的充满热情的颂扬，献身边疆保卫边防更为高昂的自信。“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王维《燕支行》），“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岑参《轮台歌》），便是前者的生动写照；“火山五月人行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则是后者艺术的缩影。“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崔颢《赠王威古》），“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依然是贯穿于盛唐边塞诗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使到了大厦将倾的唐末，苍凉沉郁为主调的边塞歌唱中，仍然不难看到对唐帝国“夕阳无限好”的余晖的寻觅与追踪。国土的沦丧，边防的蹙缩，不但引起了对统治者腐朽的咀咒，也更激发了对盛世帝业的向往，对强固边防收复失地的期盼。他们感叹着“无因得见哥舒翰，可惜西山十八州”（薛逢《感塞》），寄望于“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张为《渔阳将军》）的将领，重整河山，“行收部落归天阙，旋进封疆入帝聪”（章碣《赠边将》）。大中三年（849），当沦陷几百年的陇右河西之地一旦收复，朝野欢腾，杜牧等人竞相献诗咏歌，由衷赞颂“汉武惭夸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师……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虽不免言过其实，而追怀盛业，惜我封疆的爱国热情十分感人！

贯穿在唐代边塞诗中的这个基本主题，无疑是唐代国力强盛与疆土意识强化的产物，是举国上下、全民族关怀祖国统一和兴旺的心理情感的反映。

众所周知，自周秦以还，中国西北方境外的游牧民族，从来就是对中原王朝安全的最大威胁。而汉皇朝扫清西北边塞完成大

一统的辉煌业绩，与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动荡、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造成的创伤，又给唐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唐人极为重视前代这方面经验的总结，观其开国之初，即集中大力编修晋隋之际史书竟达七部之多（廿四史占了近三分之一）可知；唐太宗自撰《晋书》，特立“载记”三十卷，其意更在总结“夷狄乱中华”（《晋书·载记序》）的历史教训。唐人这种强烈的疆土意识，举国关注西北边塞的安危，首先是一种历史意识的积淀。

李唐建国也自有痛苦的教训。李渊问鼎中原，竟然不得不向漠北强大的东突厥称臣乞援；帝业草创，突厥又连年大规模入侵，直逼唐都，以至朝中出现迁都以避之议。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对此深感“痛心疾首……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思“雪其耻”（《新唐书·突厥传》）！因此即位之初，在修明政治以安定国内的同时，便采取了加强国防的种种措施。

《唐鉴·卷一》记太宗继位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帝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布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帝皆不听。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为此太宗才能在国家尚未从隋末动乱中恢复元气之时，便于贞观三年冬（629）派出强兵骁将一举消灭漠南东突厥势力；继而西灭吐谷浑（635），征高昌（640），击焉耆（644）、龟兹（648），置安西都护府以治理西域诸城国；又北讨薛延陀（641—646），东征高丽（645起），节节胜利，使李唐三百年封疆，在太宗手里基本上固定下来。他的这一系列行动，不但基本解决了北方、西北方的边患，保卫了帝国的安全，使李唐王朝从此得以蒸蒸日上，臻于我国封建时代强盛的顶点，而且一举恢复西汉盛时的版图，实现了汉末以来中国人恢复国家

大一统的梦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政治家从国家民族长治久安作出的深谋远虑、审时度势的抉择。

积贫积弱的宋人曾讥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唐鉴·卷三》）；诚为鄙陋之见。观其前后所为，太宗本非好战黷武之人。他采魏征之言，奉行“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国策；观其在《帝苑》中告诫太子李治，关于“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的一番宏论（《贞观政要·卷九》）；观其不纳康国（今苏联撒马尔罕）归附之请，理由即不干“务广土地”、“求虚名而损百姓”之事（《贞观政要·卷九》）；何等清醒的认识！太宗也并非是一个推行民族压迫的暴君，相反倒是实行民族和好的明主。观其言，他屡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通鉴·唐纪四十九》），“仁孝之性，岂隔华夷”（《贞观政要·卷五》）。察其行：他对突厥降户，不顾魏征等朝臣激烈反对，独取怀柔意见，于唐境内置州府安置，入居长安即近万家；（开元盛世长安居民为三十六万户，但初唐全国户口远远不到开元户口的二分之一！）而“诸部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贞观政要·卷九》），则其数尤可惊人！对边疆内附诸少数民族政权，特设羁縻州府以统之，内政自治，实际“仍为独立之民族或国家”

（岑仲勉《隋唐史·四十八节》）。实行的是何等开明的民族政策！可见唐太宗用兵塞外，强固西北边防的一系列措施，完全是基于强烈的疆土意识，着眼点乃在于接受历史教训，谋求国家版图的统一，以实现国家的安定。他对我国中古时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实有盖世之功。因为唯有国防巩固，国家统一才能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睦，这本是浅显明白的道理。

太宗的政策是成功的，得到朝野的拥护，得到几代帝王的贯彻。唐代自贞观至武则天时期六大都护府的建置，玄宗时十大节

度使之设置（北方、西北方分别占了五个和八个），均体现了巩固西北边防的战略构想。长寿元年（692）崔融上武则天的《拔四镇议》（《全唐文》卷二一九），详论能否守西域、保河西以安关陇，乃“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便体现了对太宗边疆战略的深刻理解，也是表明唐人疆土意识的极好证明。而则天重用郭元振，恩威兼并，镇守河西，扬威西域，又安西北边塞十余年（见《全唐文》卷二三三，张说《郭元振行状》），则是贯彻太宗边防政策成功之实例。太宗时“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旧唐书·刘仁轨传》），更可见整个社会的情绪和人民对太宗政策的认同。正因为这个政策是建立在民族的共识之上，政策的贯彻必然大大强化了这种共同的心理，从而巩固国防，屯垦戍边，开发与建设边疆，在有唐一代便成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方外闺门共同关注的大业，不论是初盛唐时代的勃勃雄心，抑是中晚唐时代对盛业的追怀，均为世风所系，民心所尚，卫边报国的壮歌长吟不衰，深刻根源盖在于此。这种一代之风，不但不可能是个别黷武帝王，野心将帅，或帮闲文人所可能煽起，离开古代历史上边塞斗争的实际，唐代国防的大局，执着于某些具体战争之是非或诗人某些作品的得失，来讨论一代边塞歌唱，显然也是难得要领的。

描写边塞多民族地区的生活图景，是唐代边塞诗中最为引人入胜的一个部分。诗人们向往那壮阔荒寒的边地风光，陶醉于塞外民族的风情习尚，欣赏那多姿多采的民族歌舞，用最热情的诗笔予以讴歌，从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绘写了极富奇情异彩的篇章，创造出前无古人的全新的艺术画廊。“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东无战斗，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这舒缓高亢的咏叹曲，顷刻间把我们引

到雁北高原，去领略那古代民族生活的情韵。“营州少年履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蕃面将军着鼠裘，酣歌冲雪在边州，猎过黑山犹走马，寒雕射落不回头”（马戴《射雕骑》）。如此犷放强悍的性格，当可令观者也爽心荡气，赞叹不置！“蕃州部落能结束，朝朝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李益《塞下曲》）。这生机勃勃的欢腾大草原，该是何等引人入胜；而那“平沙莽莽黄入天，随风满地石乱走”的戈壁大漠，竟又如此让你动魄惊心！还有“千峰万岭雪崔嵬，阑干阴崖千丈冰”（岑参《天山雪歌》）的银装素裹的天山，“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其“水如煮”的热海（岑参《热海行》），哪一处不能让人一新耳目，吸引你沿着它所揭示的“新大陆”去作一番“探险？”至于那“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踉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元稹《西凉伎》）的繁华边城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作》），声色缤纷、香气四溢的边地盛筵；“慢脸娇娥纤复秣，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铤右铤生旋风”（岑参《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铤歌》）的美妙歌舞，又岂能让人不向往动情！“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衣貂鼠袍”（岑参《赵将军歌》），“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番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塞上民族团结的气氛是何等热烈！“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王维《凉州赛神》），
“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王维

《凉州郊外游望》),边地的民俗又是多么奇特动人。“平沙漫漫马悠悠,弓箭闲抛郊水头,鼠毛衣里取羌笛,吹向秋天眉眼愁”(刘言史《牧马泉》),“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支著锦裘,雕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马逢《部落曲》),如此一幅幅塞上和平或战时生活的剪影,都无不给人以新鲜、奇崛、独特的美享受!

在唐代我国封建文明空前高涨的时代里,人们何以把自己的审美情趣移向自古所谓“声教所不及”的区域,从中发现了如此崭新的艺术天地?不但诗人歌手驰骋于其中,而且全社会也莫不心向往之,象岑参笔下那些最富异域风情的篇章,在当时便“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间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杜确《岑嘉州集序》)。这决不仅仅是由于文人有了出塞经历之故,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唐代这个“开放的时代”,实行民族融合,广泛汲取域外文化,而造就的开放心态的产物。

唐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光辉的时代。“源流出于夷狄”(《朱子语类》卷一一六)的李唐皇室,承袭了东晋以来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的成果,最高统治集团虽然仍以中原汉族文化正统继承者自居,却顺应着国家统一大局和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民族和好的开明政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境内各族的联系、团结、交流与融合,使国家民族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州府大凡八百五十六,其中直接统治地区只有三百多州,其余羁縻之州府为数更达五百。如上文所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附属于唐而实际仍为独立之民族国家。民族间联系交往大大加强,边境许多少数民族上层倾心内附,唐之统治权达于远方。

大量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士的徙入与汉化,使唐代成了史家所称之“中华国史第三次民族‘大混合’之时代”。岑仲勉《隋唐史·四十八节》于此曾有详论,他说:

考隋唐时代遇比邻兄弟民族有受强暴侵陵至于国破家亡者，往往划地安置之，任度其自由生活，未尝持狭隘之民族观念，强迫同化……居处既接，历年稍久，文化较低之族，辄不知不觉与我族融洽而为一，唐史中类此之归化人，乃不可悉数。

伴随民族的融合带来的文化交流，其集中表现便是史家所称的“胡化”现象。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早已指出：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毼之盛行唐代，太宗即与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而已也。

“胡化”的影响是如此深广，上自宫廷，下至民间，竞相追逐，“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旧唐书·舆服志》），成了一世之风，唐史、笔记、文艺中均有大量反映。

《新唐书·太宗诸子传》载，太子李承乾，使家奴百十人，衣胡服，作胡语，为胡舞，羊裘辫发，烹牛羊割肉以相啖；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擗面；设穹庐自居，造狼头纛，系幡旗，分戟列阵，与其叔父汉王李元昌分统，大呼刺击为乐，鼓鞀声通昼夜不绝。这虽是极端的例子，然可见所“化”之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胡化”竟已深入闺门之中。在中国男尊女卑的封建文化中，妇女的行为规范，本是最可体现一代

世风的。唐代的妇女，“女为胡妇学胡妆”（元稹《新乐府·法曲》），“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妆”（白居易《时世妆》），模仿塞外少数民族的打扮，而且与男子一样，抛头露面，戎装骑射（见《旧唐书·舆服志》），甚而出现“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的情景，进而达到“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一六）的颇为“开放”的程度。可见北方少数民族习俗的深入流行，已经对传统封建礼教造成极其强烈的冲击。

这里我们绝无卑视中原传统优秀文化或无保留地钦羨一切外来的异族文化之意。史家所论主要指“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等对西域风之好尚的胡化，本来并非仅指其表层的现象，何况这种“胡化”也并非邯郸学步式地对外族文化习尚的单纯模仿，如李承乾之乖戾作为或“时世妆”般的怪模丑样。诚如前辈学者所论，“唐人于胡乐特盛之际，绝未抛弃其自己原有之乐，而专承借重于人，原封不动，全盘接受”，唐代之乐舞，乃胡汉“合渗、融铸入妙之乐”（任半塘《教坊记笺记弁言》），“唐代的音乐为汉乐与胡乐融合的最高成就”（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乐舞如此，其它的学术文化也莫不如此！我们于此应充分肯定的乃是唐人的精神，那种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溶合，无所畏惧地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地创造和革新，充满着热爱、无比地自信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显示着热情与理性的完美结合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涵盖下，经济政治学术文化之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于是乃出现民族文化大融合大交流的伟大场面，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新血液，增加新活力，开出新生面。正因如此，从对异族习尚的爱好这种细微末节的现象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唐代社会斑斓多彩的风貌，尤可从更深层上认识一个时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刻变化。

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对异域文化之向往

追求，汲取一切新鲜事物的胆量魄力，丰富多样的艺术趣味……都是这种心理的重要表现，它是对儒家“尊王攘夷”传统思想，对中原小农经济下安土重迁保守心理，对闭户自尊、恪守宗法的僵化习气的积极的纠正！这开放型的文化氛围，正是唐代边塞诗那充满异域风情的热烈歌唱得以大量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

诚然，民族的融合，也伴随着矛盾和斗争，以至流血、战争，这是历史的客观事实。但是离开了民族的和睦团结，只有敌对和仇怨，是决然产生不了唐代瑰丽动人的边塞歌唱则也是同样清楚的事实。学术界曾有过把边塞诗单纯看成是民族矛盾、民族战争的产物的见解，显然是片面的，不确的。有必要强调指出，与这种意见正相反，边塞诗是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友好交往，造成民族大融合时代潮流的产物。

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作为这一个时代显著的特征被载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唐人有幸继承了这一硕果，在伟大帝国的沃土上孕育出异彩纷呈的文艺之花。唐代作家们以对个体的充分肯定，进而追求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和谐作为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而进行纵情的讴歌或痛苦的倾诉！当唐帝国如朝阳喷薄初升，在它的知识分子面前展开了七色斑烂的人生大道时，这种对个体生命不朽的追求就理所当然地表现为一种报效国家、社会的强烈的功名事业心了！它并非表现为对“汉代把群体、社会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伦理思想的回归，而是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大实现作为人生的目标而作的不懈追求，恰恰是对人生价值的更高层次的肯定，是历史上空前完美的人生观的体现。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创造英雄的时代。它既高度重视个人情感的无顾忌的抒发，又鼓励士人积极入世，创建功业，为皇朝大业效劳。名教束缚的松弛和文禁的松弛与科举制的普遍实行便是其一般的表现。从太宗始唐代前期帝王的兼听纳谏，倾听“逆耳”之言，又自得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述进士》）；从封建知识分子一方面追求“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无不体现出现在相对松弛的封建依附关系下对某种独立人格的认同和追求。

这种包含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强烈功名心，在唐代、尤其在初盛唐时代，乃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有唐一代著名作家中，我们几乎找不到有哪一个真正唾弃功名而忘情物外的人物，也难以找到哪一个视文章重于功名而绝意仕进潜心著述者，相反，他们既在诗文中任情地倾吐自己的理想志趣，大胆地发泄自己的悲欢欲求，又无不孜孜矻矻为功业而奋斗。思想精神的十分活跃，积极入世，自我奋斗和功业之心，在初盛唐时代国土开拓，国威远扬，边战频繁的客观现实刺激之下，在开放型文化氛围的熏染之下，改变了士人以皓首穷经，面壁吟诵求取科场高中的心态，而走上“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的新途，向往为帝国开疆拓土的千秋之业，奔赴那陌生而神奇的塞外，在烽火刀兵中建奇勋，立伟业，以实现其功名理想。李白的“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虽然是一种愤懑之言，但若对照于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之类的壮语，则不能不说，它也如实地反映了士人心态、人生价值取向的变化；作为边塞诗创作主体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应当说正是边塞诗繁荣的内在动因。

著名边塞诗人豪情激越的歌唱向我们展现了这种“价值取

向”的生动表现，在他们的诗中壮士与书生，竟然成了绝然对立、去取分明的形象：从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崔融的“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塞垣行》），到陈子昂“废书怅怀古，负剑许良图”（《答韩使同在边》）、“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王维“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均莫不如此！就连杜甫这位恪守“奉儒守官”之“素业”的“老夫子”，竟也说出“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送蔡希鲁都尉返陇右》）的话，就更可以看出世风人心的所向了。边塞诗人的代表者高适、岑参最无保留地在诸多诗作中袒露了他们的胸怀：“少时方浩荡，遇物犹尘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单车入燕赵，独立心悠哉，宁知戎马间，忽展平生怀！”（高适《酬裴员外》）“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山碛西馆》）“中岁学兵符，不能守文章，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他们都是以文学之士而从戎戍边，而追求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所谓“时来整六翮，一举凌苍穹”（岑参《北庭贻宗学士》），正是大夫文的乘时之举！即使到了中晚唐情况依然如此。诗人李益“遂别鲁诸生，来从塞车骑”（《来从塞车骑行》），一生辗转于戎幕之间，“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从军诗序》）；诗人杨凌，则以“一生孤负龙泉剑，羞把诗书问故人”（《北行留别》）而自愧自责；就连那为写诗呕心沥血的李贺，也高唱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的壮歌。可知，这实在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为此，对功名的激情洋溢的讴歌与功不成名不就的愤懑发泄，遂成为唐代边